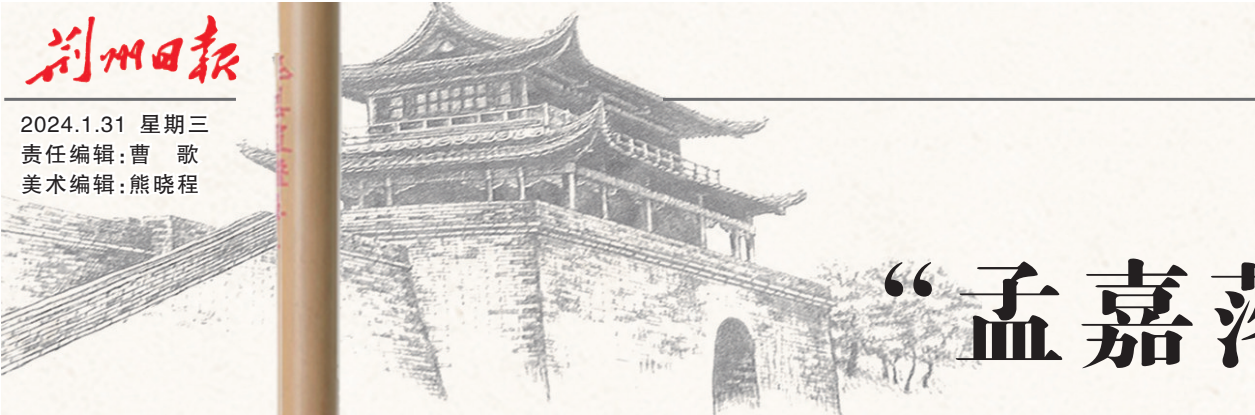




2024.1.31 星期三
责任编辑：曹 歌
美术编辑：熊晓程

“孟嘉落帽”处 龙山在荆州

□ 李子初

“孟嘉落帽”的典故最早见于《晋书·孟嘉传》和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晋书·孟嘉传》载：“孟嘉后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装。有风至，吹嘉帽坠落，嘉之不觉。温使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入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世说新语》亦有载：“孟嘉为桓宣武征西将军，九日宴龙山，僚佐毕集，俄风吹落帽，嘉之不觉。宣武命孙盛作文嘲之，嘉答文甚美，四座嗟异。”史称此文为“龙山文”，后世诗文多以“孟嘉落帽”形容才子名士的风雅洒脱、才思敏捷。多用“孟嘉落帽”“龙山会”“桓公台”等代指此事。然却经久而失，“龙山文”仅存片言残句。宋绍圣三年（1096年）重阳，暮年苏轼来到荆州龙山，不见孟嘉所作解嘲文章，写下《补龙山文·并序》，传为文坛佳话。后人在台顶置亭（1943年6月，亭遭日军兵燹），专供游人尽兴。清光绪《荆州府志·古迹》载：“《名胜志》：龙山在城西十五里，有落帽台。志称：万历间，水部须之彦改置于来苏亭畔，累土为台，以像旧游。其改置之台在今西门外二里许，龙山寺侧。而名。其土阜亦曰龙山。于是，江陵遂传有两龙山，两落帽台。”但近年学术界出现李白所登龙山在湖北荆州或安徽当涂两说，一直争论不休。为了弄清“孟嘉落帽”之龙山究竟在何处，特此考论。

唐宋地理志书中的矛盾记载

孟嘉落帽之龙山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有四种不同的说法：（1）湖北荆州（江陵）龙山说；（2）安徽当涂龙山说；（3）山东济南南山说；（4）江苏南京龙山说。以上四说中，在学术界一直争议不休的、最有影响的是“湖北荆州”与“安徽当涂”两说。至于“济南龙山”说、“南京龙山”说出现较晚，也不被学界认可。“南京龙山”说出自于明代倪震吉，他在《秋江轩诗涂》卷九中说：“艘山之南有龙广山，城西北有卢龙山，城南逾吉山三十里为龙山。桓大司马九日宴参军孟嘉，风吹落帽盖其处也。”将孟嘉落帽之龙山定位在南京市境内，此后无人唱和，可见此说无稽。“济南龙山”说出自何人不得，清人已有批驳。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济南郡城东七十里龙山镇，即《水经注》巨合城也。汉耿弇讨费贲，进兵先胜巨里，即此。东坡《阳关词》：‘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旧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谬。”苏轼《阳关词》写到济南龙山，曾有人注释苏词时，以济南龙山为孟嘉落帽之龙山。对此，清王士禛斥之“大谬”。清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五也加以批驳：“注苏者误以为孟嘉落帽之龙山，不思彼在姑孰，与济南何涉？注家可笑如此。”以上四说中，争论较大的是“湖北荆州（江陵）龙山”说和“安徽当涂龙山”说。两说均引唐宋地理志书作为证据，证明孟嘉落帽之龙山或在荆州（江陵）或在当涂。安徽当涂说的有力证据，是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当涂县”条记载：“龙山，在县东南十二里。桓温尝与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可见，《元和郡县图志》将龙山归之于安徽当涂。而与之相反，南宋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与《方輿胜览》均记龙山在湖北荆州（江陵）。南宋王象之编纂《舆地纪胜》引《江陵志》云：“在江陵县西，昔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游龙山落帽，今有落帽台。”南宋祝穆编纂的《方輿胜览》卷三十七“山川”下记：“龙山，在江陵县西，有落帽台。”又“亭台”下记：“落帽台，见龙山注。”两志均言之凿凿将龙山定位在湖北荆州（江陵）。由此可见，唐宋时期的不同地理总志中，对于龙山地理位置的记载是相互矛盾的。

在不同的地理志书中，对于一个地名出现矛盾的记载，并不让人觉得奇怪。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在同一本地理志书中，对于同一地名的记载，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如王安徽当涂说的学者注意到了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一书。该书记载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龙山”，并引《晋书》说：“大司马桓温尝于九月九日登此山，孟嘉为风飘帽落，即此。”这里认定孟嘉落帽之龙山在太平州（今安徽当涂）。而同样是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又记载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元丰九域志》“江陵府”记：“落帽台，孟嘉为征西参军，九月九日游龙山落帽，即此。”显然在孟嘉落帽之龙山的地理位置这一问题上，《元丰九域志》是自相矛盾的。出现这一矛盾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古代全国性大型地志往往取材于各州、府地志，而各地州府地志的编纂者为了提高本地声望，往往会出争夺历史名人诞生地或历史事件发生地的现象，这样就会导致同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会出现在不同州府地志中的情况。全国性大型地志的编纂者如果只是照录各地方志，而又没有尽心去查考的话，就会二说兼收，导致前后矛盾。《元丰九域志》关于龙山地理位置的矛盾记载也说明，古代地志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从《孟府君传》看龙山所在

东晋名士孟嘉是著名文学家陶渊明的外祖父，陶渊明为孟嘉所作的传文《孟府君传》自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如果能从《孟府君传》中找到确凿的证据，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孟府君传》记，孟嘉“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在朝颇然，仗正顺而已，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对这段话的不同理解是双方争论的一个焦点。对于《孟府君传》所说的“在朝”一词，持“当涂”说者以为，这里的“朝”指的是朝廷，而东晋当时的朝廷在南京。如果此处“在朝”果真指朝廷的话，那么对于持“当涂”说者当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孟嘉落帽的龙山与他所任职的地方很近，能够在龙山举行宴会后，当晚就可以返回。持“当涂”说的学者李子龙说：“在朝（今南京）能够兴起即往，傍晚便归的龙山，必在当涂，而不可能在荆州。”他认为，当时的朝廷在南京，而南京离荆州甚远，孟嘉不可能一时兴起，驾车从南京到荆州龙山，宴集赏景后再于当晚返回南京。但问题是，“在朝”之“朝”究竟是否指南京朝廷呢？将《孟府君传》所说的“在朝”理解为在南京的朝廷，其实是不了解古代君王处理政务处称为“朝”，而地方高级官吏处理政务的地方也可称“朝”。《资治通鉴·宋武帝大明元年》胡三省注：“晋宋之间，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为宋王，齐高帝为齐王，时曰霸朝。”晋宋时期，“朝”是通指一切官僚处理政务之所，只是根据官僚的不同级别，而有“郡朝”“府朝”“藩朝”之分。《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注：“朝：官府大堂。如言郡朝、府朝、藩朝。”也与上同。再如《文选·潘岳（河阳县作）诗》之一：“微身轻蝉翼，弱冠忝嘉招。在政妨贤路，再升上宰朝。”李善注：“上宰朝，谓司空太尉府。”这说明，古代司空、太尉的官府可以称“朝”。对此，我们在《孟府君传》一文也可找到内证。《孟府君传》记豫章太守褚褒离开治所豫章，去拜见庾亮时写到“出朝寮亮”，这里的“朝”就是记豫章太守的“府朝”。由此可见，孟嘉“在朝颇然”之“朝”并不能确认就是当时南京朝廷。如果此“朝”指的是桓温在荆州的“府朝”，那么对于文意的疏通更为有利。桓温府朝在荆州城，距龙山仅十余里，驾车前往龙山宴饮后，“造夕乃归”，返回城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相反，如果“朝”是指南京的话，从南京到当涂，以今天的高速公路里程计算，两地尚相距80多公里，而魏晋时交通不畅，两地相距里程肯定比今日的里程远得多，而当时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马车，要想从南京驾马车前往当涂龙山宴饮，“造夕乃归”，到傍晚时再返回

南京，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做不到的。孟嘉“在朝”非指在南京朝廷，而是指在桓温“府朝”。还可以从孟嘉的官职变化中找到证据。《晋书·孟嘉传》记孟嘉“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后，接着叙述龙山佳会、孟嘉落帽事，再按下记“转从事中郎，迁长史”。这说明孟嘉出任从事中郎和长史都是在桓温幕府。自汉朝始，三公和大将军可以“开府”，即建立府署并自选僚属，魏、晋沿汉朝开府政策，并进一步放宽开府资格，诸州刺史兼管军事带将军衔者即可开府。从事中郎与长史均为开府官职，即将军与刺史幕府官员。《晋书·职官志》：“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都督，增参军为六人，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祭酒、掾属、舍人如常加兵公制。”孟嘉所任“从事中郎”“长史”正是征西大将军桓温将军府的“府朝”官职。另据《孟府君传》记：“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这里清楚地载明，孟嘉虽曾入京师（南京），被授“尚书删定郎”一职，而孟嘉“不拜”，并没有接受任命。孟嘉离开京师后，“还至，转从事中郎，俄迁长史”，也就是回到了荆州桓温幕府，先后做了桓温幕府中的“从事中郎”和“长史”。综上所述，从《孟府君传》记载来看，孟嘉任“从事中郎”与“长史”是在荆州的桓温幕府，而“在朝”指的是在荆州桓温幕府的“府朝”，那么孟嘉“超然命驾，径之龙山”，也固当是在荆州龙山了，由此可以说明，孟嘉落帽之龙山在荆州而非当涂。

从唐诗记载看龙山所在

唐宋时期，龙山落帽台一直是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一时期，不少文人墨客都曾去龙山落帽台赏游，并作诗以记其事。从《全唐诗》中，可以找到很多登临龙山落帽台的纪事诗，其中有张说、张九龄、李白、元稹、李群玉、杨衡等人的诗作。通过分析他们的诗作，可以确定龙山落帽台在湖北荆州。

张说的《游龙山静胜寺》一诗，是龙山在荆州的一个重要重要证据。张说是初唐名相，唐开元六年（718年）被贬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出镇江陵，与孟嘉落帽仅隔三百来年。《游龙山静胜寺》诗中有“南识桓公台，北望先贤墓”句，“桓公台”即指桓温举行宴会的落帽台，静胜寺在台北不足百米，唐咸亨（670年—673年）中建，其寺北为八岭山古墓群，方向指位如此准确切，说明此诗是作者游览龙山时所作。《游龙山静胜寺》诗中首两句是“每上襄阳楼，遥望龙山树”，诗中说站在襄阳楼上，可以看见龙山上的树。那么诗中所说的襄阳楼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可以在唐代另一位诗人元稹的诗中找到答案。

元和五年（810年）四月，元稹因得罪宦官被贬荆州，出任江陵士曹参军。在江陵期间，元稹作有《过襄阳楼上上府严司空》一诗，自注云：“楼在江陵节度使宅北隅。”诗中所说的“严司空”是指严绶。《旧唐书·宪宗纪》元和六年记：“三月乙未朔……丁未（十三日）以检校右仆射严绶为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严绶于元和六年（811年）三月出为荆南节度使兼江陵尹，三年后，又加授检校司空等职。《旧唐书·宪宗纪》元和九年记：“九月甲戌朔……丙戌（十三日）……以荆南节度使严绶检校司空、蒙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因此在唐代诗文中提到严绶时，经常称其为“江陵严司空”“荆南严司空”，如武元衡有诗题为《酬严司空荆南见寄》、刘禹锡有诗题为《江陵严司空见示与成都武相公唱和，因命同作》，柳宗元有《上江陵严司空所著文启》等。严绶到江陵后十分器重元稹，曾给予元稹生活上极大的帮助，如帮助他修缮住宅，在元稹患病时给予经济资助等。据元稹《过襄阳楼呈上府严司空》诗自注，“襄阳楼”位于严绶在江陵城中府第的北面。了解这一点后，我们再来看张说《游龙山静胜寺》诗中“每上襄阳楼，遥望龙山树”两句，原来是说，站在江陵城内的襄阳楼上，远远可以看到城外龙山顶上的树木。再联系张说诗中所说的“桓公台”，自然很容易得出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的结论。



张说曾游览过的龙山静胜寺，元稹在江陵为官期间曾向严绶请假，专程去游览过，并作《早春登龙山静胜寺》诗一首。元稹在江陵期间写的另一首诗《答姚兄幼灵之见寄五十韵》中有“登楼玉梁望，落帽孟嘉情”两句，元稹自注云：“龙山落帽台去府城二十里”，则直接说明孟嘉落帽之龙山就在江陵府城外。元稹在江陵期间还作有一首《奉和严司空（重阳日同崔常侍崔郎及诸公登龙山落帽台佳宴）》，从诗题附注文字可知，元稹还曾和“严司空”严绶等人一同前往龙山落帽台宴饮，仿效当年桓温、孟嘉龙山唱和行事。从元稹在江陵为官期间的诗作，可以看出元稹是相信孟嘉落帽之龙山在江陵的。

唐代名相张九龄晚年曾被贬荆州，出任荆州长史。因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遂将荆州城南门城楼命名为“曲江楼”。张九龄在荆州期间，曾作《九月九日登龙山》一诗，诗中有“桓公旧台上”一句，同样是写桓温宴集以及孟嘉落帽事。诗中具体写到龙山的地理位置：“东弥夏首闾，西拒荆门牡”。“夏首”是古夏水在今荆州市沙市区入长江之口，在荆州古城以东，也在荆州龙山以东。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国郢都纪南城陷落。屈原《哀郢》一诗中曾写自己被迫离开郢都时的情景：“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屈原诗中的“夏首”与张九龄诗中的“夏首”是同一地方，都是指古夏水在荆州城东流入长江之处。张九龄诗中的“荆门”，是指荆门山，位于长江三峡的东口，在今宜昌市猇亭区。北魏郦道远《水经注·江水》（卷三十四）中说：“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暗彻南山，有门象；虎牙在北，石壁色红，间有白文，类牙形，并以物象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荆门山在江陵城以西，也在龙山以西。“东弥夏首闾，西拒荆门牡”，是说站在龙山之上，东望是夏首，西望是荆门山。从地理位置看，张九龄诗中所说的有“桓公旧台”的龙山在夏首以西、荆门山以东，与荆州龙山的地理位置完全吻合。

晚唐诗人李群玉（约813年—860年）湖南澧县人，一生穷愁落魄，怀才不遇。从京城长安辞官回湖南途中，曾游历荆州，作《重阳日上渚宫杨尚书》一诗。诗题中的“渚宫”是指荆州。荆州城所在的地方最早为春秋时楚成王所修离宫——“渚宫”的所在地，因此唐宋诗词中多以“渚宫”指代荆州。诗题中的“杨尚书”是指唐代工部尚书、荆南节度使杨汉公。杨公汉在江陵节度期间因贪赃而被贬职，事见唐裴庭裕《东观杂记》。从诗题可以看出，李群玉所作的《重阳日上渚宫杨尚书》一诗，是他在荆州游历期间所作。诗中写道：“落帽台边邈未黄，行人惆怅对重阳。荆州一见桓宣武，为趁悲秋入帝乡。”首句“落帽台”指孟嘉落帽事，“荆州一见桓宣武”指孟嘉在荆州见到桓宣武（桓温的谥号）。由此可见，李群玉认为，孟嘉落帽是孟嘉在江陵（荆州）为桓温参军时发生的事，孟嘉落帽之龙山在荆州。

提到龙山在荆州的唐诗，还有杨衡的《九日陪樊尚书龙山宴集》。诗题中的“樊尚书”指唐将领樊泽。樊泽于贞元三年（787年）出任荆南节度使，驻节江陵。诗中首句有“孟嘉从宴地”一句，写诗人于樊尚书樊泽宴会的龙山即是当年孟嘉落帽台。杨衡曾在江陵驻留，有诗《江陵送客归河北》为证。

以上所列举的唐诗，均为唐代著名政治家、诗人所作，他们在诗中准确的方位描述直接说明孟嘉落帽之龙山在荆州，或间接透露相关信息，可以反映出唐人对龙山地理位置的一般看法。

从宋明文献记载看龙山所在

唐代有关龙山在荆州的证据主要是在唐诗中。如果说由于律诗对语言的要求很高，与历史性的描述还有一定的距离的话，那么唐以后，关于龙山的描述就更为直接与明晰。

宋代文堂《湘山野录》卷下：“景终于一散官，寿不五十。陈康肃尧咨知荆南，怜其道穷，为葬于龙山落帽台，碑以表其墓焉。庐在荆江之沱阴，枯桑废田，子孙凋零，尽为渔樵佃估。”“景”即张景，宋代江陵府公安县人，家在“荆江之沱阴”。张景因与荆南知府陈尧咨友善，曾被推荐出任楚州宝应县主簿、大理评事等职。陈尧咨出任江陵知府时，张景在江陵去世。张景的丧事在陈尧咨的主持下“葬于龙山落帽台，碑以表其墓焉”。这则材料直接说明了龙山落帽台就在荆州。

宋范成大著《吴船录》记载作者自四川制置使召还，由成都起程取水路东下抵于临安（今浙江杭州）的所见所闻。《吴船录》卷下：“辛未，泊沙头，道大堤，入城谒诸官。”沙头即今荆州市沙市区，与江陵城毗邻，在唐宋时期是重要的港口。范成大由沙市下船后入荆州城，拜访在荆州出任知府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辛弃疾带领范成大浏览了荆州名胜渚宫、绛帐台、章华台等地，随后，范成大大向辛弃疾询问了龙山落帽台。辛弃疾回答说：“在城北三十里，一小丘耳。”荆州龙山并不高，只是一座小丘，至今亦然。

明代以后，关于孟嘉落帽之龙山在荆州的直接记载更多。明代王圻和他的儿子王思义撰写有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据该书记：“龙山在荆州府城西北一十五里，晋桓温九月九日同参军孟嘉登此山，风落嘉帽，今有落帽台。”明陆应阳撰有《广舆记》，该书记载：“荆州府龙山在府城西北，桓温九日宴此。风吹孟嘉帽，嘉不觉。温令孙盛作文嘲之，嘉应声而答四座叹赏。”明万历《荆州志·方輿书》第514页记载：“纪山之东南二十里曰龙山，山蜿蜒游龙。高岭二八道，西北而来，其支为白（拍）马山，为蛇山，为鸡山，为摩旗家，为龟家，东至于太晖山，又东尽于落帽台。晋桓温参军孟嘉九日登龙山落帽处也，台畔有龙王宫，总之皆龙山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记载：“龙山，在城西北十五里。桓温九日登高，孟嘉落帽处也。”这些文献都直接记载孟嘉落帽之龙山在荆州。

从字典辞源记载看龙山所在

《辞源》（合订本 1988年7月第一版，商务印书馆，1962页）载：龙山：（一）山名。1.在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晋桓温九日登高，孟嘉落帽处。参见“孟嘉落帽”。2.在河南宝丰县。3.在今辽宁省朝阳县东南。4.在今山西浑源县西南。（二）县名。龙山落帽（1968页）：晋孟嘉为征西大将军的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宾僚成集，皆戎服。有风吹嘉帽落，初不觉。温令孙盛作文以嘲之，嘉即时以答，四座嗟服。见世说新语识鉴“武昌孟嘉”注引孟嘉别传。宋辛弃疾稼轩词念奴娇重九席上：“龙山何处？记当年高会，重阳佳节。谁与老兵共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老兵，指桓温。

《中华大字典》（1935年版，中华书局出版，1978年10月第一版，2996页）载：龙山：山名。《清一统志》：山在湖北江陵县西北十五里。《晋书·孟嘉传》：九月九日桓温宴龙山。僚佐毕集。

诸典均无二指，证明史上一致认为孟嘉落帽就在湖北荆州。

综上所述，孟嘉落帽之龙山应不在安徽当涂，而在湖北荆州。荆州龙山落帽台位于荆州古城西北龙山（也称八岭山）南端的一处山岗上。据考古工作人员称，山岗的顶部有一座古墓，应该是在先秦时期的楚墓。这座位于山岗的楚墓也就是所谓的“落帽台”。“落帽台”是这一地区的制高点，站在“落帽台”台上极目远眺，一面是连绵起伏的八岭山，一面是一马平川的农田以及泛着粼粼波光的湖水，是登高赏景的绝佳之处。正因为如此，自东晋开始至唐宋时期，几乎到荆州来的文人墨客、谪官过客，都要登临其上，吟诗作赋，使得“落帽台”声名久盛不衰。

（本文部分资料参考了长江大学徐文武先生的文章，特此鸣谢）

二〇二四年第三期 总第七十八期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⑤4

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市委宣传部 市文旅局 市文联

联合出品

文化荆州

编者按：
“落帽台”，作为一处具有深厚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的古典地名，其具体位置历来众说纷纭，荆州民俗学者李子初先生经过严谨细致的研究，得出“落帽台”实际位于荆州八岭山的观点。

历史研究是不断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期待更多学者和专家能够就此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以期全面揭示“落帽台”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为弘扬发展荆州传统文化贡献智慧和力量。